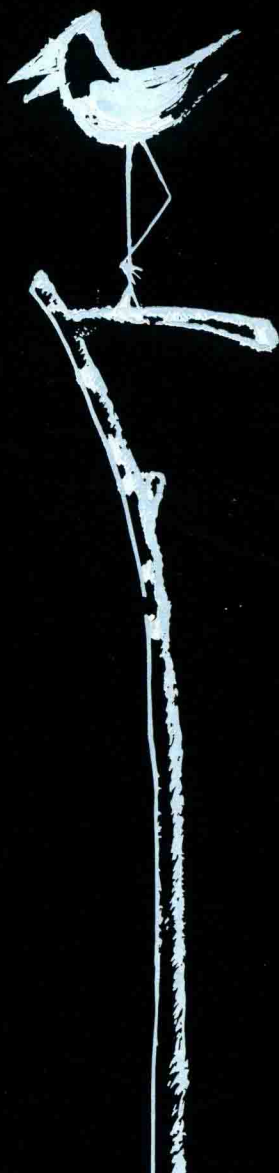


会议室 与山丘

李敬泽

——
著



会议室 与山丘

李敬泽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议室与山丘 / 李敬泽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86-9028-5

I. ①会… II. ①李…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841 号

会议室与山丘

著 者: 李敬泽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028-5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大方
s i g h t

序

四年前，出一本书，名叫《致理想读者》。所收的是有关文学的文字和言谈。然后接着谈、接着写，晓行夜宿，雪落桃花开，四年来又零零碎碎攒下一本书，起个名字是“办公室与山丘”。

本来是想叫《知难集》的。语出《文心雕龙·知音》：“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章学诚《知难篇》申说此义：“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刘勰、章学诚，千载同慨，说的是，知言难，知心更难，知言知心而又知人于世者，又比更难还难。

这说的都是批评之难。或者说，做一个理想读者之难。从刘到章，反复申说一个“难”字，是在反复提醒我——我们这些以评论家或批评家自命的人——毋妄、毋欺，审慎、精进。成为他人之知音，成为天下之知音，这是何其难的事，难到近乎不可能，批评生涯就是在不可能中修行，求一线可能。

年来饶舌，在很多场合说到，我已是一个“前批评家”。这其中就有“知难”之意。是自知，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其实所知少、所见浅。我当然不至于写不出小说就宣布小说死亡，写不好批评就宣布批评无意义。批评意义重大，已经有很多锐气方张、身强力壮的才俊投入其中，驽钝如我，确实做不好，就该知难而退。所以，我真正想要的名字是“而退集”，我喜欢其中的一份诚实。

但最终，《而退集》也未用，编辑担心，这老气横秋的一“退”就退得没人读了。没人读我其实也不太在意，但又有明白人说：声称“而退”，结果还写了这么一大本子，这不是作法不自毙说话不算话吗？想想此话有理，所谓求诚而得不老实，遂放弃。

现在的书名是《会议室与山丘》。“会议室”好理解，无论在写实和隐喻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思想、言谈和文字都是在一个个真实和想象的会议室里展开的。他一直在参与讨论、与人对话。没有什么独语的批评家，没有什么作为自足的个人的批评家，他自身就是一个会议室，他永远敞开，永远在倾听、说服或者争辩。

然后呢，什么是“山丘”？那不过是李宗盛的那首老歌：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 就快要老了
 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

无知地索求 羞耻于求救
不知疲倦地翻越 每一个山丘
越过山丘 虽然已白了头
……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那一日，在车里听着这歌，忽然苍凉欣喜，不可断绝。当然我尚未白头，估计因为遗传也白不了头，当然我也不很在乎是否有人等候，除了无人等候你还等候什么？我只是觉得，生命中竟然是山丘连绵，永无尽头……

感谢我的读者。感谢我谈论到的那些作家。感谢书中的各位对话者。你们构成了我所在的会议室或论坛，我之所说也许是浅陋的，但从你们的声音里我获益良多。

李敬泽

2018年6月2日凌晨

目 录

序 001

第一辑 “伟大的中国小说”及其他 003

知命问答 017

世界、传统与工作伦理 026

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037

湖畔闲谈录 046

谈野马尘埃 067

作为“散文家”的我 076

第二辑 一本书,我的童年 089

我的第一篇评论 095

向湖心之洲 097

向理想而去	101
岳雯小记	107
批评家之“我”与昆德拉与空间	111
“统”与“通”与“推”	122
会议室与荒野与豹	129

第三辑	家门内外的“亲”们：文学与家庭、社会	135
	声音与历史	144
	再论内在性的难局	150
	劳作与创造者安眠	166
	修行在人间	170
	古老而长新的故事	179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182
	“挂托邦”	188
	终于认出东君	191
	枯竭而写	195
	一切的理由	198

第四辑	致法兰克福书展	203
	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我们在谈论什么	206
	谈非虚构	221
	总体性与未知之域	228
	儿童文学的再准备	232
	作为恶人或好人的编辑	238
第五辑	有机村庄与点灯	245
	榆林之马语	251
	提灯认人伤心	255
	遥思人间事,且看石头记	259
	诚品书单引言	265
	《秋风破》跋	268
	无字记	270
	子夏的敦煌	274

“伟大的中国小说”及其他

——答杨辉

自“五四”（或晚清）以来，西学资源在极为广泛的意义上参与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建构，并构成了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潜在的“成规”，规约着作家及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偏好。这在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显露。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接续已然“断裂”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成为理论家及批评家思考的重要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事到如今，我们在自己身上都已经没有办法清晰地区分出“中”和“西”。比如像现在这样谈论问题的方式：在全球化语境下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接续已然“断裂”的传统——可以说是无一字不“西”。

我的确谈过重新认识和勘探中国传统的小说资源的问题，也谈过希伯来的“灵魂”与“中国之心”的对比。但是，我现在觉得，“断裂”和“接续”这样的词很容易把人带到沟里去。“传统”本身就是个现代词，预设一种现代态度。我反正没见过古人把“传统”挂在嘴边，古人讲“统”就是讲“道统”，但那个“统”恐怕已经彻底断

掉了，它现在大概只能在书斋里推演运行。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是一个活的过程，是认识、想象、发现和阐释，是一种自证。新文学运动以前，小说、戏曲、小品文等等皆不入流，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在建构现代文学的同时，也建构了传统，然后才有了四部古典，才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个谱系，这是那一代人建构出来的，所以，当我们道听途说地指责“五四”割断传统时，我们所说的文学传统其实是“五四”的遗产。古代只有一个“统”，而且统就是归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是被“统”的。“传统”是现代的，你不是被统的，传统传统，不传不统，传什么怎么传取决于你，这是一种现代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从没有失去传统，我们失去的是“统”。当然失去“统”问题也很大，现代以来百年颠簸，就是为了重新解决“统”于“一”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性疑难，但这和文学上的传统还不是一个问题。

您认为现有的批评话语“范式”有待转变，需要在吸纳西方批评资源的基础上重启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这不是我认为的，是多年来很多人都谈到的，只是谈论甚多、进展甚少。很多事是说起来很爽，做起来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其实也没打算真的下手。传统文论中主要的一块是诗文评，假如你用这个来阐释现在的作品，你一定会发现，它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很难应对复

杂的现代经验。重启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我想主要是把传统文论作为对话对象，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参照，比如读金圣叹的批点，不是为了成为现代金圣叹，那很荒谬，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眼光、他的重点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有意思的是，有时这种不同是头脑的、理论的，而不是身体的、感觉的，批评家们按现代以来建构的一套批评话语去思考 and 写论文，但是，读者，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不按这个读，还是按金圣叹的读，也就是说，金圣叹常常比我们更及物、更贴心。我有时觉得，他也许比我更接近中国人对小说的内在期望，他指出的正好是中国人五百年前关注的和五百年后依然感兴趣的。这个差别就构成了一种颇具理论价值的空间，这里边有我们的批评范式漏掉的那些东西，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是恒常默运、家常日用，因而不言自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过时了，而是在我们的批评范式之外，他照亮的地方正是我们灯下黑的地方。

作为 90 年代以来文学现象的见证者和阐释者，相较于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您觉得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有何优势？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太想。优势肯定有，局限也肯定有。我只是不太愿意拿它和 80 年代相比，这种比较很可能被我们关于特定年代的幻觉、偏见和利益所支配。

有学者援引鲍曼的“立法者”和“阐释者”的说法，指出在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中，批评家大多是以“立法者”的姿态，依据一定的标准（政治的或艺术的）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做出评判。而80年代之后，批评家逐渐成为文学现象的“阐释者”，缺乏为文学立法的能力，并将此视为批评滞后于创作的重要原因所在。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这种说法真能把鲍曼先生气死。这里所说的“立法者”并不是领先创作，而是规训创作，这些学者真的不知道这种规训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吗？这种滞后、领先的说法是词语的误用，创作和批评真的在赛跑吗？它们是在一个跑道上吗？批评对创作的引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阐释本身就是重要的，如果阐释不重要，那么孔子也不重要了。社会和公众对文学的理解是在阐释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理解又会反过来影响作家。必须看到，批评在这个时代的境遇相比于十七年、“文革”，乃至80年代都要复杂得多，在60年代做一个批评家和在2013年做一个批评家简直是火星与地球之别，简单的比较又有什么意义？

您的批评思维、批评模式，被认为“是自觉地习得了中国古代诗文评的方法，特别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精神。”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如同意，选择这样一种批评方式是出自个人心性，还是有别的考虑？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大概是中外批评的共同精神。我们

现在的问题是出乎其外的本事很大，入乎其内的能力很小。最近看了一批论文，感觉有些批评家，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材料功夫了得，理论素养也好，但就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只看得到合于他的理论框架的景象，他很信他的理论，也就很信他的材料，但看这些论文，我常常感叹，他不知道，天下最应该怀疑的可能就是他那堆材料。理论之洞见是在光滑无疵的地方看出裂隙、矛盾、不协调，否则就是理论打滑，永远出乎其外，真实的世界也就永远出乎意料。文学批评是如此，其他学问也是如此，读有些文章，你能闻到入乎其内的气息，一看就是老狐狸，对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有一种直觉的和经验的把握。对文学批评来说，不知世道、不贴人心，无论如何都是致命的问题。

对我来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呢，我自己很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反躬自问，我倒觉得我可能更近乎作家批评——也就是我和作家是站在一边的，倒不是帮着他说好话，而是，有点近似于脂砚斋，更多地贴着作家的、创作的角度去想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理论要用，不用就对不起我十年青灯黄卷，我觉得，作家的创作中包含着一些比理论更强大更辽阔的东西。

在为施战军《碎时光》所作的序言中，您写道：“战军当然批评人，但他的批评通常是文雅的，这种文雅与其说是对批评对象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审慎的认识论立场：战军相信并欣赏世界的复杂性。”“他清明地

意识到他话的边界在哪儿，意识到他的话是对世界无可奈何的简化，意识到在他的话之外还有很多话，而他的话不太可能正好就是独一的真理。”这也是很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如果认可并尊重这个世界和写作的复杂和多元，如何避免批评的“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绝对主义并不是把自己变成花岗岩脑袋，价值相对主义也不是变成一个无原则的滑头，更不是失去善之所善、恶之所恶的勇气。在这里，我的着重点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向着新鲜活跃的人类经验开放的能力，不要成为一个浅薄固执的陋儒，这个物种我们自古不缺，于今也不缺，他们抓住一点死理，就以为拿到了万事万物的尺子，一路比量过去，轻易而坚决地下判断。李国文先生曾说过，有些搞文学的人本来应该当会计。这个话我鹦鹉学舌，反复借用。本该当会计的搞了文学，当会计的却像小说家或诗人，这是文学的不幸也是财会业的不幸。古人说，上善若水，这话说得真好，为什么是若水而不是若石头若火腿？因为水有随物赋形的能力，水不执。善是艰难的，真正的善——善到了耶稣、佛陀，他们就是大水，包容、怜悯、承受然后涤净一切垢。你说这是绝对还是相对？

您觉得“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新媒体和自媒体，使得权威和文化权力面临极大的挑战。在这个